

“围绕殖民地台湾的日本、中国与南洋”国际研讨会情况简介

作者：罗敏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5-10-29

由北海道大学松浦正孝教授召集的“围绕殖民地台湾的日本、中国与南洋——帝国、身份认同、网络”的国际研讨会，于2005年9月2日至4日，在日本札幌召开。来自日本、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新加坡和英国的20余位学者与会，共提交论文20篇，以日据时代的台湾为中心，涉及当时的日本、中国、英国、南洋（东南亚）等之间的国际关系、超越国家之上的人的网络及意识形态、国家和个人的身份认同及其间的冲突等方面。

关于本次会议召集的主旨，松浦教授从现实与历史两方面进行了说明。他指出，在东亚因经济关系而变得更加密切的同时，因日本“入常”问题，历史教科书问题，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引发了日韩关系的恶化和中日关系的紧张。日本国内对此论调大致分为两派：一派是主张“东亚共同体”论，另一种论调为主张“新脱亚论”。这一情形与福泽谕吉于1881年在《时事小言》里所提出应与东亚各国共同合作来防卫西洋势力，与1885年在《时事新报》发表脱亚论等的情形非常相似。此时与彼时的日本均站在历史的分歧点上。本次学术讨论会所讨论的1930、40年代的东亚情势与当下的东亚情势，是与全球化过程中的帝国及国民国家问题、网络问题，且也是在此居住的每一个居民个人的自我认同问题，具有很强的共通性与连续性。松浦接着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了“四大帝国的重层化”问题，指出，游荡在东亚上空的“历史认识问题”实质上是与在相当长时期内控制亚洲的“中华帝国秩序”、“大英帝国秩序”、“大东亚共荣圈”和“美帝国秩序”——四大帝国秩序紧密交织在一起的。

殖民地时期的台湾之所以成为本次会议讨论的重心，反映了以松浦正孝为代表的日本学界对二十世纪30、40年代的日本帝国秩序（大东亚共荣圈）形成的认知。松浦指出，1930-40年代日本帝国的秩序意识（东亚新秩序，大东亚共荣圈）是中华帝国秩序和大英帝国秩序这两个秩序的混合体，且是要对抗这两个秩序而产生的。使日本帝国秩序方向性发生巨变的是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和满洲事变。高桥财政政策下的黄金出口禁令所造成的日元贬值，使日本的轻工产品急速地向世界各地出口，而满洲事变使日本丧失了中国市场，日本制品转而向印度、东南亚等英国的亚洲殖民地出口。对此英国政府和大英帝国殖民地政府采取了进口限制政策，这造成了日英间的贸易大摩擦，引起了以纺织产业为中心的经济民族主义。另外满洲事变造成了日本的孤立，日本不得不退出联合国，这又唤醒了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巴黎和会上为了消除人种歧视法案所遭受的挫折，及因为美国移民限制法中所受到的人种歧视的记忆，使得再度高举亚洲联盟论等泛亚主义旗帜。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在1933年3月以松井石根为中心成立的大亚细亚协会。以此为转折点，日本由长期以来北进论和南进论的并立状态因而转向南进论。同时，日本由以朝鲜殖民地建设、满洲国建设的“大陆的帝国”建设转向，以殖民地台湾为据点，以华侨控制的“海洋亚洲”为支配圈，以及支持大英帝国的亚洲据点印度独立的“海洋帝国”的建设。[\[i\]](#)因此，台湾在日本南进政策推进过程中的作用实不容忽视。松浦指出，殖民地台湾与台湾籍民是大日本帝国主义在军事上、经济上对抗再生的中华帝国秩序及大英帝国秩序之关键。[\[ii\]](#)

日据时期的台湾史方面的论文，涉及日本的对台统治系统、1930年代台湾知识分子、殖民地台湾的“反英运动”、台湾总督府的外事政策、日治时期台湾与海南岛关系、台湾与满洲国间的贸易等方面。

冈本真希子（早稻田大学）以高级官员的人事变动为中心，分析了殖民地时期日本的台湾统治系统。指出，1930年代初为止，常见的日本—台湾间高级官员循环模式，在武官总督时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台的“土生”（文官高等考试合格后即赴台就任的日本人）官员的升迁、退休高官的滞留台湾，和新占领区的转任等形式，减少了来自日本的“移入”官员，增强了“独立性”。

驹入武（京都大学）试图通过还原1935年4月发生的荷兰籍船只珠诺号船长的待遇问题，解读关于殖民地台湾的“反英运动”，探讨作为日本殖民地的台湾到底在日本的反英运动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曹大臣（南京大学）通过对1937年至1945年间台湾总督府外事政策的研究，指出，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台湾总督府为因应战时需要，其外事政策相应发生变化，一面限制台人与大陆之间的往来，一面设法与汪精卫政权协力，“经略对岸”。1941年“大东亚战争”爆发后，为协助日军顺利南进，总督府采用各种手段打压南洋华侨势力，并对南洋诸国进行政治经济统制，以期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作者得出结论认为，1937至1945年间，台湾总督府的外事政策，受日本政府外事政策、总督府治台政策以及战争等诸多因素影响，呈现出复杂的历史性格。在“战时无外交”论调的支配下，一切均以军部为主导，日本外务省机构出现萎缩。总督府的外事政策，自然深受战事影响，但因台湾的特殊环境，其外事活动仍有很大空间。

何义麟（台北教育大学）根据日据时期台湾知识精英林献堂的日记，通过对1933年12月台中出现的“东亚共荣协会”的活动的研究，考察1930年代台湾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指出，这一团体并非如过去所认为的是右翼运动之组织，它是被右翼团体所激发出来的特殊团体，是殖民统治者为了化解抗日民族运动阵营抗争而创设的缓冲装置。共荣协会是由台日双方有力者所组成，双方主要干部对“内台融合”与“日华亲善”理念都保持一定的想象。但是，1936年后在军部强势干涉之下，台湾人被迫展现“忠君爱国”之言行，“内台融合”与“日华亲善”之理念彻底幻灭，共荣协会也正式瓦解。从共荣会的兴衰显示，殖民统治体制下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存在着永远无法跨越的界限，唯有被殖民者获得全面的解放才有可能打破这个界限。

钟淑敏（台北中研院近史所）透过在日本殖民统治下所产生的“台湾经验”，如何应用于海南岛“军政”的分析，来探讨日本殖民统治的特质。指出，台湾总督府虽然在异民族统治（包括教化、保甲及警察制度）、热带医学、热带产业及调查研究等方面积极输出其统治经验。然而，台湾作为日本帝国殖民地的地位，以及“重层”的结构从未改变。

林满红（中研院近史所）过分析1932年满洲国成立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为止，日本势力范围底下的满洲国与日本殖民地的台湾之间的贸易关系，及与当时台湾对华南贸易的比较，指出，台湾对满洲多为直接贸易，对华南多为转口贸易；台湾对华南的贸易走私较对满洲国贸易显著。

日据时期台湾的外部环境，包括与台湾关系密切的华南、香港、日本和英国等方面的情形，是本次会议研讨的另一个重心。其中涉及中国方

陈红民（南京大学）将1932年至1936年间以胡汉民为中心的西南政权与广东地方实力派之间的关系概括为“矛盾的联合体”。一方面，他们的政治取向基本相同，是利益上有相互依赖关系的联合体。另一方面，他们在如何进行“反蒋”问题上存有分歧。其矛盾的实质是，“中央型政治人物”与“地方实力派”因政治抱负不同而产生的冲突，是“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对决。

罗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通过还原福建事变前后西南与中央从对立走向交涉的过程，探讨在因外力入侵引发的救亡统一的民众心理背景下，面对中央统一化政策的压力，西南是如何因应的。指出，西南与中央关系在两个层面上展开。一为西南“中央”与南京中央间，即以胡汉民为首的西南元老派与以蒋汪为核心的中央政府之间。二者在“制的问题”上之争论实为军权与党权之争的继续。“人的问题”上的矛盾核心为汪精卫的去留。西南虽由坚持“蒋汪下野”，转为单独“劾汪”。然蒋在“最后关头”到来之前，因需汪在政治上替他分谤，因此虽在一定程度上默许手下的反汪派别运动排汪，借以迎胡，但绝不会轻易打破蒋汪合作的政治格局。“人的问题”，因汪的偶然遇刺，方告解决。西南与中央之间的另一关键矛盾为“中央”与“地方”之争，其实质为割据问题，是中国政治自古便有的“痼疾”。解决逻辑则为“成王败寇”，你死我活。然因日本入侵，外力因素为解决“中央”与“地方”矛盾的传统逻辑提供转变的契机。由于“独立民意力量”的出现，当时的社会产生一种希望矛盾的双方能够通过建立制度性结构来理性解决冲突的社会心理期望。然而，现实政治的演进并未如社会心理所预期。政争中的双方依然推崇着传统的思维方式。处于强势的一方在不放弃武力解决的前提下，力图通过金钱与名器的诱惑来分化和瓦解反对的一方。政府的“混争方法”不仅为舆论所诟病，也令“体制内”人士忧心忡忡。由是观之，无论政争结果如何，西南与中央均非赢家。

苏维初（香港城市大学）通过汪精卫与大亚细亚主义的研究，指出，强调中日合作的大亚细亚主义是孙中山政治思想中一个常常提及的话题。但当孙中山1924年在神户发表大亚细亚主义演讲时，汪精卫并不赞同这一主张。从1920年代到1938年和平运动发轫为止，大亚细亚主义在他的政治思想中很难寻觅到踪影。当他决定与日本合作后，大亚细亚主义思想才复活。因此，汪精卫的大亚细亚主义思想完全是当时政治环境的产物，并没有深入汪的政治理念中。东亚联盟运动，是汪精卫贯彻其大亚细亚主义思想的具体实践活动。汪所追求的目标是，政治独立和文化交流。但这一运动成为日本国内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李培德（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探讨了1920年至1940年代的中国共产党对香港华商统战工作的背景、过程和成效，指出，由于香港是一个经济和商业发达的社会，情况和内地不同，没有可以让中共容易培植势力的工人和农民阶级，因此中共要插足香港社会，不得不从早期的海员和后期的商人开始。中共对华商的统战手段是从多方面来进行的，包括组织各种类型座谈会、聚餐会、联谊会、俱乐部、运动小组等，联络与香港华商的感情；同时创办了《华商报》、《经济导报》和派人渗透到其他媒体，从事舆论宣传方面的工作；注意对香港华商团体的统战工作。香港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中共华南交通路线的枢纽和国内革命的后勤基地。

松浦正孝（北海道大学）以日本方面推进泛亚主义的大本营大亚细亚协会为中心，说明日本是如何利用泛亚主义作为战争和外交的手段，在此基础上以蒋介石政权内日本情报分析的第一人王芃生为中心来梳理中国方面的对策。作者认为，日中战争的扩大并使之与“大东亚战争”相衔接的是以松井石根和头山满为首、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颇为流行的泛亚主义。泛亚主义举起反英主义的大旗，高喊“亚洲属于亚洲人”的口号，以联省自治为基础将中国分而治之是其目标，日本则是经济和政治上的盟主，这就是泛亚主义所规划的亚洲秩序。与此相对，王芃生则通过印度与英国相互提携、突出日本在亚洲的殖民统治与泛亚主义之间的矛盾、主张以中华意识为基础复兴“强大中国”、其目标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秩序的重整。这样，台湾、南洋、华南和华侨无论对哪一方，其重要性都是不容忽视的。

西泽泰彦（名古屋大学）通过对日本在东亚地区殖民地和占领区的物资、人力和信息的流动考察，分析台湾在其中的作用。指出，在东亚的日本占领区中，不仅在日本国内和个别占领区之间存在着物资、人力和信息的流动，占领区之间的互动交流也不可忽视。台湾是物资、人力和信息流动中的一个环节，由于它与中国、华南地区和东南亚的联系一直存在而未被切断，因此它超越了“日本帝国”的版图，为物资、人力和信息的流动提供了可能性。

英国学者安东尼·贝斯特（Antony Best）通过对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英国、日本与华南关系的研究，认为，1930年代英日在华利益的冲突不应当被视为势力范围方面的竞争，而是关于中国未来发展观念的根本对立。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对华政策已发生转变，由扩张势力范围，转向门户开放。然而当时许多保守的日本人支持扩张势力范围，并确信这一主张将为英国人所接受。因为他们确信英国人与自己同样具有扩张帝国势力的倾向。然而，这只是日本人一厢情愿的看法。虽然扩张势力范围的主张在那些关心中国事务的英国精英中有一定的支持者，但他们对白厅政策的制定没有影响。日本学界与思想界均低估了英国对华态度，更广泛地说是帝国主义，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开始转变的程度。

南进过程中的南洋是与会学者关注的又一焦点。刘宏（新加坡国立大学）通过对二十世纪东亚区域秩序的研究，认为东亚与东南亚华人社会与商业网络有着悠久的历史发展背景，并在新的区域格局下成为影响经济成长的重要因素。在整个二十世纪，这些网络是在与国家市场的频繁互动中发挥作用，并在这一进程中调试自身的机制和功能。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东亚区域秩序，并非以民族国家为中心，而是一种跨越政治疆界和种族界限的，以海洋亚洲和内陆地区相关联的有机体。作者希望透过解构和重估华人社会和商业网络的历史性、空间化、制度性和局限性，能够有助于从历史的和空间的视野重新审视当前学术界关于网络、认同和民族主义的辩论，并推动区域研究、族权研究的社会科学化和有机的整合。

李盈慧（台湾暨南国际大学）通过考察战时汪政权、重庆国民党在泰国侨社的争夺战，指出，由于泰国民主主义的勃兴，排斥华侨的亲近中国，加以日本对泰国逐渐加强控制，使得国民党势力消退，汪集团得以藉机渗透侨社；华商在泰国和日本的双重威迫下，以及自身商业利益的考虑，遂转而拥护汪政权。国民党的对策则是致力于与同盟国的合作及拉拢泰国的反日势力，希望华侨配合盟军作战，忽略侨务党务工作。双方都未能以华侨的处境为主要的决策重心，结果最后得力的可能是中国共产党。

河原林直人（龙谷大学）通过南洋经济恳谈会的考察，分析了南洋协会和南洋政策之间的关系。作者对“南进”概念提出新解，指出，前人的研究多强调南进的国家意志这一侧面，但这不只不过是对南进相关问题的抽象理解。已有研究大多集中在关注战时政府和各官厅在经济管制体制推进方面的政策变化，未及关注这一系列管制政策所涉及的经济活动主体的反应。对这种背景下南洋日本人必须采取的对策方面的研究几乎可说是空白。南洋协会是台湾总督府、南洋日本人、外务省、内地企业家等各方在南进这一共同旗帜下形成的组织。作者透过1939年南洋协会主办的南洋经济恳谈会的召开，揭示了南洋日本人与政府南进各部门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利害关系。

-
- 1 松浦正孝： 战前战后历史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四个“帝国”在东亚的重层化。
 - 2 松浦正孝： 泛亚细亚主义之台湾要因——两岸关系与日本、英国与中国间抗争的政治经济史背景，《北大法学论集》第55卷第3号（2004年9月）。

文章录入：zhangzhiyong 责任编辑：zhangzhiyong

- 上一篇文章： 从对立走向交涉——福建事变前后的西南与中央*
- 下一篇文章： 二、三十年代南开大学的办学特点

[【发表评论】](#) [【加入收藏】](#) [【告诉好友】](#) [【打印此文】](#) [【关闭窗口】](#)

最新热点

最新推荐

相关文章

- 二二八事件的宣传与研究
- 台湾光复初期的贪污问题
- 论国民政府收复台湾策略
- 直属台湾党部述评
- 纪念台湾光复 促进祖国统一
- “纪念台湾光复60周年暨两岸
- 台湾日据时期的统治特点与陈
- 日本对台殖民统治的法理剖析
- 李国鼎与台湾资讯电子产业
- 关于台湾史研究中“国家认同



网友评论：（只显示最新10条。评论内容只代表网友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

版权所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地址：北京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1号 邮编：100006 传真：65133283